



体育文化对构建上海城市文明体系的干预

路云亭

摘要: 上海市政府于 2016 年决定在 2025 年前将本市建设成世界知名体育城的决议具有超体育的解读空间,它在多维度上触及上海市民的奥林匹克想象。上海是西方体育在中国的觉醒地,上海市民原本就具有浓郁的体育情结。上海的体育文化源于早年西侨的俱乐部活动。20 世纪 20 年代是上海华人体育取得初步发展的时间节点。体育在上海出现的初期就伴随着上海的时尚的生活,成为上海摩登化生活的一部分。上海早已是一座体育名城,其对体育名城的追求理应在更高端的理念上实现。现代上海体育应当结合竞技性和生活性两者之长,再铸上海新的体育发展模式。2025 年后的上海体育无法完全脱离奥运元素,而基于奥运理念之上的城市美学、设计理念、本土创造力、国际法系传统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赛事价值。

关键词: 国际化;高端原则;上海;体育生活化;宜居城市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07(2016)05-0010-08



The Intervention of Sports Culture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Urban Civilization System

LU Yunt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The Center for Sports, Media and Culture,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Shanghai Municipal Government's decision of building Shanghai into a world-renowned sports city before 2025 can be interpreted far beyond sports. It touches the Olympic imagination of Shanghai people multi-dimensionally. Shanghai is the awakening city of Western sports in China and Shanghai people have a strong feeling toward sports. The sports culture in Shanghai originates from the early club activities of the Western aliens. The period of 1920s saw the preliminary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Shanghai. Sport in Shanghai has been accompanied by modern lifestyle ever since the beginning of its appearance and has become a part of the city's modern life. Shanghai is already a well-known sports city. Its pursuit for a famous sports city should be realized with top concept. Modern sports in Shanghai should combine the advantages of competitiveness and life features and create a new sports development model for the city. After the year of 2025, sport in Shanghai is not possible to separate itself from Olympic elements completely. But the traditional value of urban aesthetics, design concept, local creativity and international legal systems, based on the Olympic concept, will be much greater than the event valu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ization; Top Concept; Shanghai; Sports life; Livable City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上海都是中国乃至全世界令人瞩目的城市。上海市政府于 2016 年决定在 2025 年前将本市建设成世界知名体育城。此决议出台后,引起了沪上体育界人士的积极响应,其影响力也波及体育圈外。如果仅仅从字面上看,将上海打造成世界著名体育城并未具备绝对的创新意义,理由极为简单,上海已经是全球知名的城市,因为有了朱建华、姚明、刘翔、孙雯等世界级运动员,上海的体育名人效应已经达到了国内的最高境地,换言之,上海早已在体育上获得了世界知名度。上海的体育普及率在全国名列前茅,上海的体育设施、体育人口、体育意识的深入人心程度等各项指标都位列中国前位。那么,市政府为何还要特意强化一种世界著名体育城的意识?其中诸多的潜在议题需要释读。

1 漂浮于沪上的民间性奥林匹克城市想象

将上海建设成世界知名体育城是一种简约的理念,但其中蕴含重大意义。它首先涉及到上海的国际形象问题。一般认为,上海在中国一直居于领先者的地位,这是一种习惯性认知,但是,上海究竟在外地人、外国人和上海人心目中是何等形象?回答这样的问题反而很难,上海自身的文化混合性导致上海之城的每一种细节都充满了复杂性。上海的形象涉及到自评、国际评论和国内评论 3 种,其中的差异堪称巨大。评价上海往往难以离开体育元素。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中国国内的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竞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热潮,先是 2010 年广州举办了第 16 届亚洲运动会,紧接着武汉于

收稿日期: 2016-09-02

基金项目: 上海市体育局项目(TYSKYJ2016001)。

作者简介: 路云亭,男,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体育传播。E-mail: luyunting666@sina.com。

作者单位: 上海体育学院 体育、媒介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 200438。



2012年举办了第27届汤姆斯杯羽毛球赛,而南京则于2014年举办了第2届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杭州将要在2022年举办第19届亚洲运动会。中国各大城市竞办大型体育赛事早已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关注,其中褒贬不一、评价各异。笔者认为,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质言之,现代中国各大城市竞相举办大型体育赛事是中国的国家仪式严重匮乏的结果。

1949年是新中国的成立年,新中国的建立同样以新的国家仪式的确立为标志,新的国家仪式确立以后,旧有的仪式便自然而然地遭到废黜,而中国的旧有仪式大多隐藏在民间,呈现出多维度、小型化、复合性的存在状态,这些仪式往往伴随着土俗性、巫术性和反现代的元素,和新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有抵牾,于是,旧有的仪式在被人为地张贴上“反动”“封建”“落后”“腐朽”之类的判词后马上遭到禁止,旧式的国家和家族仪式几乎立即消亡。改革开放以后,类似的仪式逐渐恢复,但是,有些仪式的传承是肉身相传,当一代代的老的仪式人逝去之后,很多仪式就地消亡。现代中国村落文明的失落和旧的仪式的失落有直接的关系。在村落庙宇文化消失的前提下,中国的民间性和国家性仪式都面临短缺之态,直到当下,中国仍是一个仪式匮乏的国家。中国各大城市不厌其烦地申办各种各样的体育赛事,恰是仪式匮乏国家的仪式饥饿感所致。当原先所有的祭天、祭地、祭人仪式消亡之后,新颖的可供替代的仪式就会如期而至,中国各大城市申办各种赛事的文化学基础即体现在这里。

类似奥运会这样的体育赛事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它还是一种理念、身体行为、人体极限表演集大成的文化实体。现代体育很难脱离城市,换言之,现代体育本就是城市的产物,它源于古希腊雅典的城邦祭祀活动。体育和城市的联姻可以催生出许多副产品。世界顶级体育赛事在中国各大城市的举办更加强化了体育与城市的特殊纽带关系。尽管上海在2011年也举办了第14届国际泳联世界锦标赛,但该项赛事在中国并未形成很大的影响力,对上海这样级别的城市而言,该项赛事算不得大赛事。换言之,上海举办的世界大赛不少,但最顶级的赛事如奥运会、足球世界杯始终未曾见到。

还须还原上海城市的本貌。上海在20世纪的20至40年代曾经是中国乃至亚洲的一枝独秀的超一流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其在当下的地位相对下降,即便如此,如今的上海至少也能和北京、香港齐名。问题随即出现,北京已于2008年举办过一届夏季奥运会,还要和张家口联合举办2022年冬季奥运会。于是,人们按照举办大型赛事和城市级别的对应关系指向自然会产生更大的想象,上海是否需要举办一届甚至多届类似奥运会那样的世界顶级赛事?因为上海对应的欧洲城市是伦敦和巴黎,伦敦已经举办过3届奥运会,巴黎也已举办过2届奥运会,那么,上海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挑战?当然,上海对应的美国城市纽约,始终未能举办奥运会。问题的复杂性再度呈现。

回答上述问题充满了艰难感。其实,上海和奥运会以及奥林匹克文化的关系非常紧密。创刊于1926年的《良友》曾报道过3届奥运会。奥林匹克一度译作“夏令配

克”,上海曾有一座欧洲人创办的电影院即以夏令配克为名。“1914年由西班牙商人雷玛斯(A.Ramos)创办。夏令配克(Olympic)是‘奥林匹克’的旧译。最初放映外国影片;1925年后,90%以上的国产影片在该大戏院首映。……1929年,夏令配克大戏院首先在场子里安装有声放映机,生意一度极为兴旺。”^[1]张鸿声曾对此作出解读:“雷玛斯开设的夏令配克影戏院是有许多文人故事的影院之一。这家影院除了地段上的优势,还是一家肯为国产影片提供放映机会的影戏院。中国第一部长故事片《阎瑞生》于1921年7月1日首次公映于该院,中国第一部爱情故事片《海誓》于1922年1月23日首映于该院,中国第一部侦探武打片《红粉骷髅》于1922年5月10日也首映于该院。”^[2]上海的《申报》曾对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以及1948年的伦敦奥运会做出报道,展示出当年中国奥运新闻传播的最高水准。在此意义上看,上海在此时还在谈论上海和奥运会以及奥林匹克文化的关系其实只能说是一种续接、补偿或还原行为。由于上海所具备的独特的欧洲文化品格,奥运会对上海来说只能说是一种十分匹配的文化点缀。

就在1993年北京申办奥运会失败后,以《美国之音》为代表的西方媒介就对上海或广州申办奥运会成功的可能性作出了积极、正面和肯定性的答复。2016年初夏时节,笔者曾在沪上对上海建设世界体育名城以及上海举办奥运会等论题做过一些随机的调研。不管是新上海人还老上海人都认为,上海是全中国最富有现代理性的城市,上海人一直保持着不为外界所动的独特的生活节奏,用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他们把控着看似平淡实则平稳且快速的城市发展进度。就在地城市膜拜翻天覆地变化的热潮中,上海人却未必愿意发动那种惊天动地的城市建设运动。从历史的现状看,上海人并不热衷于所谓的“一炮走红”“一举拿下”“大步跨越”“一步迈进”之类的跨越式发展理念,上海人对大跃进式的各项行政措施有一种天然的防范、戒备、屏蔽和过滤心理。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在全国各地一度开展得红红火火,唯独在上海遭遇到了阻力。上海人不大相信砸锅卖铁、拔钉敲锁可以提高钢产量,也不太相信仅仅提高钢铁产量就能搞好社会主义。文革时期中国的青少年暴力现象一度十分普遍,上海也深受其害,但是,相对而言,参与暴力事件的上海青少年基本维持了不温不火的状态。文革时上海的红卫兵以气度温和闻名,很少有极富邪恶性的暴力性行为,野性十足的批斗之类的活动在上海更是降低到最低的程度。上海就是这样,它凭借城市规则中的自然理性就可以轻易地过滤掉人性中的极端性行为,并用一种自然的现代城市本能将某种由社会运动中的错误导向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矫正到常态档位。

超级稳定的发展节律给上海人提供了全新的经验,他们从不相信任何一种里程碑式的举措可以改变这个城市的发展轨道。上海就是这样,具有一种温和、健康、自然、大气的城市理性,这种城市理性就像一种天然的差错矫正表、毒素过滤器、自动升级机,不断地为上海的机体提供动力。上海的城市理性秉承的是一种日常性、法制性和人性的自然理念。2011年,上海市政府将上海的城市精神定位



为“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其中的“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就有历史的实例作为底垫，这8个字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上海的历史的真实写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谦和”的品格，它造就了上海不温不火、不急不躁、不盲从也不冒进的上海式城市理想。上海有其本真的城市理性，它从未犯过反现代性的重大的错误，在以伦敦、利物浦、纽约、巴黎为范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上海无须向国内的任何省市学习现代城市建设的经验。

上海还是中国城市学的一张名片。21世纪以来，全国性的城市学学术会议成为新一轮的显学，每一届的会议上以上海为主题的论文占到了全部会议论文的95%以上。各种城市学会议不得已要求与会者不要以上海为范本，并限定了关于书写上海之城的论文数量。由此可见，上海似乎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学的唯一典型性案例。人们无法忽略掉上海而在全国的其他城市中寻找城市现代性的合理性。在一种温和、理性和常态化的市政管理理念的统摄下，上海已然成为中国地位无法撼动的明星城市。需要指出，上海的非凡性决不体现在突发性、爆发性、“一惊一乍”的经济或文化业绩，而展示在市民生活的细节层面。

中国的双城记有两种版本，一种是沪港对抗，一种则是京沪之争。无论如何，上海都是中国城市无法或缺的核心力量。代表西方文明、海洋文化与江南风尚的上海和体现北方重镇、旧有帝都、国家首善之区的北京，一直有一种城市性格差。同样面对现代体育赛事，上海人和北京人的自然态度就存在一种极大的分野。北京申办2008年夏季奥运会，官方统计的民众赞同率接近100%，而民间的赞同率也达到了举世罕见的94%。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2022年第24届冬季奥运会，来自北京的民间赞同率也达到了80%以上。在北京人的城市理念里，官方性和民间性的差异并不大，申办奥运会再度体现出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意志。显而易见，北京是政治城市，民众的政治思维发达、政治视野开阔、政治诉求强烈。但上海不同，现时代的上海已经不再担当更多的政治职能，或者说不再正面承担全国性的纯政治性的功能。当今的上海只承担全国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以及部分文化功能。人们经常将北京看成是中国的大脑，而将上海当做是中国的核心。前者象征着思维，后者象征着生命。在身体或生命本体的意义上看，心脏和大脑的作用完全不同，却有着同等地位的重要性。生理学家曾将大脑和心脏看做是无法出现错误的终极性生理区域。这个比喻虽然未必完全符合城市的功能，但在城市人类学的视野上看，人体犹如国家，城市功能约略等同于人类的脏器功能。上海便是以一种经济发动机式、城市领跑者和现代性示范区的姿态在全国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功用，在现时代高度竞争化的环境中，上海必然要展示出其独特的精神风貌。坦言之，上海人不会简单地拒绝奥运会，但也不会不假思索地全方位地接受奥运会。理由很简单，上海是一座高度理性化的城市。从现代性的意义上来审视，上海是中国资格最老的“高辈分”城市，其示范性要远远大于吸纳性。而上海以外的其他任何中国城市都无法在现代性的指标上超越上海。问题在于奥运会是否可以强化一座举办城市的先进性？中国是否还要继续逐猎在世界体育的赛

事竞办程序中？中国是否一定要在体育赛事的举办浪潮中实现现代化转型？

这里需要从探索城市的性格说起。探讨上海的城市性格极为艰难，因为上海本身的复杂性比起单纯性要大得多，人们至今无法彻底探明上海之城的真正本貌。罗伯特·沙克尔顿在《纽约录》一书中曾这样描述纽约：“从任何角度来讲，纽约都是一座与众不同的城市。当提到波士顿、费城、芝加哥或者旧金山时，人们通常会谈论这些城市里的人们在想什么或者做什么，可是没有人在提到纽约的时候会谈论它的人民，而只会谈论这个城市本身。因为这座城市比它的人民伟大得多！是纽约造就了它的人民；在别的地方是人民造就城市。”^[3]用这样的论断来形容上海，也极为合适。上海缔造过很多名人，但任何名人都无法超越上海本身。或许可以说帝王家族造就了北京，江南士绅缔造了苏州，盐商缔造了扬州，但无人可以缔造上海。上海只是资本之城、美学之城、梦幻之城、世界“魔都”，它不属于任何家族，上海更是一座有史以来中国人从未见过的现代城市，它以平等、资本、个性、规则、理性、创造以及勇气构成，展示出一种中国旧制度中从未见到过的城市格局。上海在近代已经出现过李惠堂、郑吉常、蔡龙云等体育名家，而新上海又在体制上将体育置于一种更高端的地位，实现了高端体育低端化位移的可能性。上海凭借深厚的体育传统一直将体育的日常性特质保持得相对完整。

2 上海之城的体育基因及其变异途径

还须说到上海体育的原点。上海不仅具有其独特的历史延脉，如果从中国本位的意义上说，上海还是一座属于江南性、殖民性、大河性和海洋性混合而成的城市，换言之，上海是一座遗留之城，或者说是一种历史遗产式城市，它的主导者、始创者、设计者大多已然逃离了这座城市，而后来者更像是一群涌入者、占有者、享用者，生活在这里的人只是上海遗产的继承人，而无法充当上海这座城市的原创者。上海寄托着欧洲人的理念，也泛滥着中国人的智慧。上海是一种世界城市史上的奇葩，它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新鲜的，并具有独一无二的特质。人们无法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找到任何一座城，其典型性、影响力、多维性、复合性可与上海相提并论。上海的城市性格至今无法获得完全的解读，更难以彻底地呈现在世人面前。2010年上海举办世界博览会前夕，上海外滩和南京路上的几座著名的建筑得到了大修的机会，其中包括和平饭店和大光明电影院。人们在大光明大影院中发现了后来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邬达克密码。邬达克密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97年11月7日上海银行职员在汇丰银行穹顶发现的“世纪壁画”。现代媒体人乔争月还在北京路的一所老式洋房里发现了共济会的“上帝之眼”图案。上海就是这样，优雅图形美学、神秘的符号美学和近代商业智慧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和全世界任何一座近代化城市都不相同的美学、文化和时尚风貌。

上海本身就是一种充满奇幻感的中国故事。故事演进到这里，关键的问题赫然出现，体育在上海的地位如何？

质言之，上海从来就不匮乏体育元素，甚至可以认为，



上海一直就是一座体育之城。上海的体育同样源于西方侨民。且以上海的跑马场为例,上海的跑马场一度三易其址。《上海体育志》对此有所记述:“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租界侨民建第一个跑马场(在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口),占地81.7亩。至1850年组成上海跑马场董事会。内设有抛球场,又称‘老公园’和‘抛球场’。清咸丰元年(1851年)租界侨民在‘老公园’举行第一次赛马。“英跑马总会将跑马场土地分十块出让,在1855年又另辟跑马场(在今浙江路南京路一带),占地171.4亩,人称‘新公园’。”^[4]上海的跑马场改为后来的跑马厅标志着市民精神的崛起。“清同治元年(1862年)跑马总会将跑马场搬到静安寺路(现人民公园),人称‘跑马厅’,占地500亩。西侨公共运动场董事会,出卖原有运动场,组成上海运动事业基金,在新跑马场内圈购430亩,租给各西侨运动总会,各总会先后在这里开辟了抛球场、滚球场、高尔夫球场、棒球场、足球场等。该场称公共体育场,外圈则专用以跑马。”^[4]上海几乎是西方体育在中国的先遣者、排头兵和发酵地。再看《上海体育志》中的几则材料:“清咸丰二年(1852年)黄浦江上出现外商船员组织的划船比赛。”^[4]仅从竞技环境而论,上海的体育项目呈现出水上水下、泥地草地、大院小园式的各种类型。上海的体育还依托在其多样化的教育体系内。“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圣约翰书院举行以田径为主的运动竞赛会。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西侨游泳总会于跑马厅东北部建立游泳池,为上海第一个游泳池。”^[4]其中,中国的女子体育也最早发端于上海。“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上海三等公学、南洋公学、上海育才书店等新式子堂先后开设体操课。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我国最早的自办女学堂上海经正女学,开始设立体操课。”^[4]由此可以看出作为体育之城的上海体育的发展根脉。上海的体育发展有其独特的脉络,起先是外侨参与,中国人大体处于旁观地位,之后便有教会学校通过课程设置积极开展起了体育活动,它使得教会学校的中国籍学生率先得到了近代体育的知识。第三波则是市民中的中产以上成员的参与,它构成了上海体育本土化的先驱。

至于上海西侨为何参与体育活动,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上海西侨源于欧洲,而欧洲本是现代体育的发祥地,上海西侨将体育当做一种生活方式来对待,结果在上海缔造出一种新的体育生活风尚。还有一些学者关注到了上海西侨的精神需求问题,认为上海的西侨参加体育俱乐部是为了排遣孤独感,借助体育活动来忘记羁旅之愁。《上海的英国人》一书中有位英国人曾说:“刚到上海来的人安顿好了以后,便要考虑加入哪个俱乐部。上海有很多俱乐部,每个国家和每项运动都离不开俱乐部。”^[5]体育的聚会功能在此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现代人一度机械地将体育看做是一种提高身体素质的工具,殊不知,体育的真正功能在于聚会。乔冉曾对此做出过解读:“那时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总会,像英国总会、斜桥总会、法国总会、德国乡下总会、美国哥伦比亚总会、俄国总会。每个项目也有自己的联合会,像板球总会、打靶总会、杓球(高尔夫)总会、拍球总会、曲棍球总会、勒辩别球(英式橄榄球)总会、游泳总会、西联会(上海足球联合会)等。俱乐部是人们运动的

基本组织形式。”^[6]由此可见,西侨在上海早期体育的传播方面的作用很大,西侨的体育活动也就此奠定了上海的体育风尚。

上海从其诞生起就是一座移民城市,所谓移民城市,指的是一种由于人员流动因素而带来的文化高度重构的城市,它涉及血缘混合和文化兼容两重概念,而后者则带有群体性的身体、基因和血缘重构的内蕴。还需要放开眼界看问题。如果从文化史和文明史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本来就是由多个民族组合而成的,它在历史上经历了3次大的民族融合与重组的时期。首先,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恰是在经历了春秋战国时期的混血与移民期后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也是多民族重组的身体的混血期,同时也是文化重构的时期。雷海宗认为南北朝是中国文化第二个关键性的发育时期。“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383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虽然无论在民族血统上或文化意识上,都可说中国的个性并没有丧失,外来的成分却占很重要的地位。”^[7]中国民族的多元化格局的高峰期是近代。由于天灾、战乱等因素,近代中国的各地民众出现过大量的迁徙现象,它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血缘、文化和思想的多元化程度。上海便是在近代化、海洋化、移民化大潮流中形成的一座全新的国际化的城市,它也同样是一个民族混合的新城市,所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民族混合更多地出现了来自遥远的欧洲人种。英国人、法国人以及其他欧洲人和美国人等,构筑了上海人口的新品格。即便在国内而言,上海也称得上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其移民人数高达85%以上,但是,上海之所以在世界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其中不应忽略早期西方侨民的商业、文化、法制传统的移植。具体到体育的领域而论,如果排除掉西方侨民的体育生活,上海的体育文化就等于空中楼阁。换言之,排除掉西侨体育,人们几乎看不到上海体育的本真风貌,而遗漏掉西侨体育的真实存在的情貌,上海体育的历史就是一部残缺不全的历史,其所造就的是一种对历史叙事的断裂、阻隔和虚无性、否定性现象。

3 体育一度是沪上民众的时尚生活

一般以为,上海在整个20世纪20~40年代都是中国的时尚之都,其中就包涵了体育的元素。在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初的60多年的时间内,西侨逐渐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体育赛制,在身体特性、规则意识以及游戏态度等方面给在沪华人做出了示范。体育在上海的地位向来很高,主要是因为它和时尚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时尚是一种中产阶级化的文化,近代上海的体育也和中产阶级的生活紧密相关。张爱玲之所以成为现代上海的文化符号,就在于她是上海中产阶级审美理想和生活趣味



的代言人。上海的体育人有其独特的培育与生发阶段,第一阶段是西侨阶段,由于翻译出来的这一阶段的外文文献较少,从近期翻译、整理出来的一批资料看,西侨在上海的体育生活类似当今欧洲人在本土的体育生活,呈现出赛事的规范性、规模的适中性 and 明星的多元性。西侨在上海的体育活动逐渐引起了当年的中国人的关注,但在 20 世纪的前十余年内,中国人鲜有投身其中者,看客基本上是中国人的固定角色。中国人为何在 60 年的时间里只看西侨参与体育而自己充当看客,未能很好地投身到体育活动中来,其中的原因值得深究。大体而言,中国人受儒家思想中轻视身体行为教义的影响,花费在看体育的时间要远比参与体育活动的时间长。这种现象给中国现代体育的练与看的非对称的格局提供了一种样板。20 世纪 20~30 年代,沪上华人中产阶级以上的群体逐渐形成,此阶层原本就有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加上此时的西方体育理念已经成熟,上海的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都出现了大量的体育设施,这便让他们终于开始大范围地投身到体育活动中来了。中国的第一部体育电影《体育皇后》就拍摄于上海,且以上海为背景。《体育皇后》为联华影业公司 1934 年出品的默片,导演为孙瑜,影片中由黎莉莉饰演活泼开朗且野性飞扬的林瓔,张翼饰演的云鹏是林瓔的表哥,暗示出那个时代的一种特殊的爱恋关系。影片一扫中国早期电影以苦戏为主的阴柔格调,林瓔的运动装充满了现代感,一派与世界接轨的朝阳气概;云鹏高大英挺,阳光万丈,洋溢着现代都市的崭新的中产阶级化的生活趣味。《体育皇后》显然注入了大量上海早期华商世界里奋斗成功者的元素,此时的体育已经成为一种新型阶级崛起的经典符号。其实,早期的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都是一种崭新的城市成员,他们告别了农耕文明的体系,一同接受资本经济的洗礼,并尽量融入世界性的工业文明的体系,而体育则在其中起到了促成性的文化媒介的作用。在《体育皇后》中,半裸露的女性身体,新式寄宿制学校女生的洗漱生活,竞华女子体专健美女生在新式草坪上飞奔、投篮、投掷的视觉图景,构成了一种完全新颖的电影语汇。体育在这里转化成了一种会说话的思想。《体育皇后》是中国体育题材电影拓荒之作。海派电影还在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反复出现体育元素。1936 年,黄嘉谋编剧、方沛霖导演的《化身姑娘》讲述的是一个家庭婚姻故事。影片开头不久就出现了“孙少爷”“周五少爷”和林文冲在张菊翁家花园里打羽毛球的镜头。影片还出现了张家管家为孙少爷买游泳裤的镜头,张菊翁要多买一条游泳裤,管家还要继续陪同张菊翁学游泳。体育元素在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形态中进入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江南电影制片厂于 1957 年出品的电影《不夜城》中也有一帧体育镜头。《不夜城》的编剧是柯灵,导演汤晓丹,影片的开头与孙瑜导演的《体育皇后》相似,外景选择在上海的外滩码头。解放后,在公私合营社会氛围的强大压力下,工业资本家张伯韩心情压抑,而孙道临扮演的张伯韩在其女儿的邀请下在自家花园打起了网球。张伯韩女儿张文铮由师伟扮演。两人的抽球动作虽然谈不上十分的专业,却也以亮丽的动感元素融入到电影以及影片设置的情境中。《不夜城》展示的是从 1935 到 1956 年的上海工业

界的情况,其中的体育元素同样折射出了那个时代上海人特殊的生活方式。

平面媒体对上海当年的体育报道更为丰富,其中报道体育内容较为集中的杂志有《良友》、《玲珑》等。《良友》是一份画报,创刊于 1926 年。《良友》画报内容较为驳杂,其中不乏大量国内外的体育信息。《良友》分别报道了 3 届奥运会、远东运动会以及全国运动会。从电影到报刊,从活体的影像到详尽的文献评述,上海的体育传播不仅反映的是上海市民的一般性体育生活,上海体育从一开始就以细节的方式呈现出来,展示出特定年代特殊的社会阶层体育所具备的优雅性、时尚性和温馨性。“1930 年代国民党的宣传就明确指出,民族的振兴取决于每位公民的强壮体魄。……大众杂志上为了迎合妇女健身的口味,也刊登身着泳装的明星或为脚踏车打气的女郎的大幅照片。”^[8]由此可见,上海的体育主体和上海的社会变革关系紧密,两者的联动造就了上海体育与上海时尚的基本内涵。

体育的主体永远是人。当历史造就了上海的时候,上海也在适当的机会回馈了历史,并呈现出另外一番社会镜像。上海的私人企业在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逐渐开始实行国有化改造,至 1956 年,上海私人企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基本完成,至此,上海所有的私人企业完全归国家所有。此时的租界不仅早已彻底废除,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也全部予以剥夺,包括外商在内的私人企业都在各种各样的新式政策条款的挤压下退出了中国,而与其相关联的则是绝大多数的外侨撤离了上海。但是,只要细心观察可以得知,很多外侨并未直接返回他们的祖国,而是选择了有宽松移民政策的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出,上海西侨的上海化特质已经非常鲜明,当他们脱离了上海后很难获得更为理想的生活环境,上海西侨走出上海后,大多成为新兴移民国家的新移民,而他们最终放弃的是他们本真的上海市民的身份。外侨以及部分资产阶级的撤离并未给上海带来体育承序方面的断裂状态,却使得上海的体育从另外的途径获得了新的跃进、提升与飞速发展。

如果说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上海体育是由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主导的话,那么,新中国的上海体育则加入了大量的无产阶级的元素。新中国的体育体制一度完全照搬前苏联,实行举国战略。体育机构作为国家事业单位,得到了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持,国家开始定向性地建立从少体校、专业队再到国家队的一条龙式的培育优秀运动员的机制,中国的体育运动员享受到了高出中国人平均生活水平的待遇。这种体制变革直接提高了运动员的竞技水平,强化了运动员的国家荣誉感,同时,体育在国家强力机构的强烈干预下,实行了专业化的管理,这样的体育制度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优秀人才,也为随后的奥运会的金牌战略做出了制度性保障。新时期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中国中产阶层化时代迅速到来,原先的那种苏联式体育体制的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质言之,举国体制呈现出管理僵化和脱离群众的现象,这样的体育发展模式逐渐变成了一种与民众日常性生活无关的另类的体育。由于举国体制内部机能的惯性作用,这种由旧体制中派生出来的诸多负面体育现象一直未能得到彻底的改变。



只要翻看一下关于上海体育史的文献就会发现,现代上海的体育曾经完全是一种计划体育。“为了贯彻国家‘省一级以上体委,继续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力争在1984年奥运会上获总分前六名,为国争光’的总体战略目标,1979年起,上海体育发展按照我国参加奥运会的要求,调整了上海运动项目的布局,突出了田径、游泳等基础性项目。”^[9]上海体育正如中国的其他地区的体育一样,一切皆在行政机构的掌控中,它使得体育本身的自然性、自由性和身体自主性得到了抑制。质言之,20世纪50年代以后上海体育的竞技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尤其是原先为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主导的体育变成了工人阶级为主导的体育,上海的体育添加了更多的人民性。然而,一切向前苏联看齐的做法也使得上海体育原先的自由化、鲜活化、个性化、时尚化、生活化特质得以削弱。外国人再度参与到上海体育事业中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如1994年1月27日,“3名外籍球员向申花足球俱乐部报到,接受1个月的试训”^[10]。此时的外国人参与到上海的体育活动中来已经和上海外侨参与体育活动完全不同,这样的外国人到上海来参赛,丧失的是那种自发性和主动性,它再度证明,原先属于高度生活化的上海体育已经降解到很低的程度。

仍须回归到奥运会主题和上海市民精神的总题目中来。通常而言,低调精明、恪守法律、温文尔雅是一般国人对上海人的印象。就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后不久,上海在2010年举办了世博会。按理说,世博会的地位未必低于奥运会,中国的中央政府一直给予北京和上海大致同等的地位。事实也的确如此,世博会原先是一种工业产品的展示会,它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商品交易会,其原始形态和奥运会有形似处,都源于一种类似中国庙会的商品展示会。第一届世博会于1851年5月1日在伦敦举行,它是第一场世界性的博览会,因此,世博会比创建于1896年的现代奥运会的时间要早45年,但在1896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世博会的影响力要远超奥运会。1900年的巴黎奥运会、1904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奥运会,其影响力都无法和世界博览会相提并论,中间还经历了1908年的伦敦奥运会、1912年的瑞典斯德哥尔摩奥运会、1920年比利时安特卫普奥运会、1924年的巴黎奥运会、1928年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奥运会以及1932年的美国洛杉矶奥运会,这一期间的奥运会开展得并不顺利,因为奥运会本身的业余性质,其商业感召力不强,其所张扬的理念也很难得到全世界民众的认同和呼应,奥运会几乎陷入一种勉为其难的境地。直到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这一切才开始改变。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得到了德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因为有希特勒主导的纳粹集团的影子,一些学者都将其当成了一种奥运史上的另类。形成此局面的原因很简单,希特勒利用了柏林奥运会。

先说工具论。一般认为,柏林奥运会早已沦为纳粹集团向全世界展示一个新德国形象的工具。无可否认,纳粹集团对柏林奥运会极为重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宣传德国是一个爱好和平且有对外开放襟怀的绝佳机会。在随后的赛事以及相关的活动中,柏林奥运会的主办者的确不忘彰

显纳粹的主体思想,还出现了号召所有入场选手都向主席台致举手礼的现象。英国体育代表团并未向主席台行举手礼,结果受到了主办者的冷遇。总体而言,柏林奥运会的确受到了纳粹集团的利用,但在摒弃工具论的视野上考量,柏林奥运会也的确缔造了奥运会历史上的诸多新纪录。第一,柏林奥运会首次引入了火炬接力的仪式。按照规定,火种必须来自奥林匹亚山,采集者必须用火炬接力的方式将火种从奥林匹亚山传到奥运会主办国。这一形式至今仍在沿用。第二,柏林奥运会首次实行电视转播。当时的柏林市内竖立了25个大屏幕,市民们可以免费观看各种赛事。这样的电视转播格局在现代奥运会举办国仍然存在。第三,柏林奥运会首次拍摄关于奥运会的电影纪录片。柏林奥运会电影纪录片拍摄导演是莱妮·里芬斯塔尔,其电影无可避免地美化了希特勒,但是,除去其思想的负面意义外,专门为一届奥运会拍摄一部电影的做法,已经开创了奥运史和电影史的先河。一部电影可以给后人留下来丰富多采的可视性奥运会史料。“在《意志的胜利》中,里芬斯塔尔通过真实的影像,不仅开了运用电影艺术对意识形态加以美化的先河,将她自己对当时政治的理解及对意识形态的赞美完整地表现了出来,而且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努力,达到了对纳粹党的赞美及对希特勒神化的目的。”^[11]柏林奥运会在项目设置上也别具一格。篮球、独木舟和手球首次入选奥运会,同时马球则是在奥运会中最后一次露面。柏林奥运会还创下了许多纪录,如美国13岁的格斯特林获得3m跳板金牌,12岁的丹麦女选手因格·索伦森获得200m蛙泳铜牌,上述两人都保持着奥运史上获得奖牌最年轻的纪录。其实,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开创了举办国动用国家机器完全干预奥运会进程的先例。于是,问题立即出现,如果上海举办奥运会,如何选择最佳的举办方式?此问题将成为考量上海人智慧的又一难题。

无可否认,上海一度享有东方第一大都市的美誉,但在近年来的国际城市竞争力评比中,上海始终无法再现当年的辉煌。2015年世界城市竞争力排名,上海仅列第19位,与排列前四名的伦敦、纽约、巴黎、东京差距较大。不仅如此,2015年中国国内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为深圳第一,香港第二,上海第三,这种排名虽然未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但它强化了上海的相对没落感,而面对此情此景,更多的上海人只能被动地停留在一种无语、无辜以及无奈的状态中。尽管城市竞争力评比并无体育的直接性的选项,但是,体育对一座城市的潜在的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很重要的作用。

4 构建体育名城的先决条件是建设宜居性城市

有过旅居英国经验的刘志民曾说,构建体育城市的先决条件是构建宜居城市,这在全世界都是一样,包括伦敦、巴黎这样的国际都市。体育名城一定是宜居城市,这是国际通例,更是绝对性的刚性化的指标。上海要在2025年前构建世界知名体育城市,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将上海建设成宜居城市。

上海也的确在做这样的努力。“据有关报道,上海、四川、河南、广东等地都在制定规划,准备将自己所在的城市



打造成‘宜居城市’。如上海市认为,‘宜居城市’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房屋居住环境,所以要维护上海房地产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营造上海‘宜居城市’的良好环境,确保市民持续分享上海经济发展的成果,他们是从城市市民的居住工程来理解‘宜居城市’的。”^[12]由此可见,上海市在2005年所制定的宜居城市的标准突显的仍是经济指标,尚未将城市环境、居住舒适度以及美学格调等指标纳入其中。“叶文虎教授认为,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是‘宜居’的,有很多指标,同时还有一个公众满意的问题,不是几个学者、几个规划师说了算的。人的天性要和自然亲近,亲近的含义就是人在这个环境里感到很放松、舒适。‘居’不仅有‘居住’的意思,还有‘生活’的意思。”^[13]中国的城市原本不存在宜居与否的问题。宜居与否只是工业化时代到来后的新事物。就当下而言,宜居城市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建设的终极目的,至少在理论上说人们渴望做到这一点。“所谓‘宜居城市’,就是适合人们居住的城市。它必须具备两大条件:一是自然条件,这个城市要有新鲜的空气、洁净的水、安全的步行空间,人们生活所需的充足的设施;二是人文条件,‘宜居城市’应是人性化的城市、平民化的城市、充满人情味和文化的城市,让人有一种归属感,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市的主人,这个城市就是自己的家。总之,健康、安全、舒适是人们到了后工业时代所追求的‘宜居城市’。”^[14]上海一直是一个充满现代性进取意志的城市,上海在20世纪20~40年代之所以一枝独秀,和它独特的地理环境以及人文背景分不开。那一时期上海的工业产值约占全国的一半,1949年上海的工业产值相当于全国的大半,原因在于全国缺乏像上海这样建构相对完备的可供出海的天然良港。上海的法律和文人精神又与西方近乎完全接轨,多般的因素导致上海出现了短暂的30年繁华格局。如今在举国一致化的开放境遇中,上海除却港口的优势外,早已没有了当年垂范天下的地缘文化和社会基础。上海电影的先锋范式、海派文学的尖端格局、海派艺术的示范体式早已成为历史,它们连同风姿绰约海派建筑的设计传统,都已汇总为一种文化旧影,一同随着时间的流失而断裂、淡化、消亡。在文化复兴的层面上说,上海其实一直面临空前的文化缺失性的危机。如今的上海想要再度成为亚洲文化的核心,几乎没有机会,人们看不到上海成为亚洲城市领袖的档位空间。如果说还有一点空间,那便是体育。换言之,可以唤醒上海人曾经的超前意识的只能是体育,这是上海的城市性格决定的,也为上海在现阶段的客观处境所限定。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都是人的载体。乡村是人类的原点,而城市则是人类的高峰。乡村是人类的初年,而城市是人类成人殿堂。美国的理查德·桑内特曾说:“如何让社会中具反应力的身体能找到感官上的舒适点,尤其是在城市里,身体就会变得不安而且孤独。”^[15]行文到此,已全然可见人类建造的城市和人类自身的身体的紧密关系。既然身体和城市的距离如此之近,那么城市的身体化问题就会自然显现。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再度涌现,体育城和宜居城市的关系究竟如何?这个问题在纸面上说极易解决,因为体育首先可以带给人身体的存在感,它还可以强健人的

体魄,而体育带给人的最高境界又是精神的愉悦。于是,任何人要想做到身体健康、精神愉悦,就必须生活在一个适宜居住的具象的环境中。

上海市民对举办奥运会的矛盾、游移与暧昧的态度具有多元性内涵,大体归纳如下,其一,担心房价波动,自己利益受损,或者在竞办奥运会的过程中无法拿到和别人一样的利益。其二,担忧股市波动,导致市场秩序不稳定,并最终使得本埠股民无法受益。其三,大范围的街道改造破坏了上海部分街区的自然美学理念,导致了无法逆转的损失,这种大拆大建的做法割裂了上海的城市美学,灭蚀了上海的街道韵味,中断了上海的历史脉络。上海的黄浦、静安、徐汇区都有部分街道拓宽,大量近百年的优雅且风姿绰约的老建筑被人为地拆除。河南路的拓宽,使得原先充满了旖旎之美的街道变成了与中国任何一座普通城市极为雷同的通衢式马路。一些百年以上的建筑的拆毁更是让人唏嘘不已。原先法租界的住宅区本是不宜变更的高档住宅区,却仍旧遭受到道路改造带来的建设性破坏。

质言之,上海原法租界的高档住宅区是一种整体性的世界遗产,其珍稀性十分突出,它们是在吸收了巴黎、纽约、伦敦等城市住宅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人类住宅精品。华山路、常熟路也在街道扩宽的运动中失去了既有城市美学法则。笔者曾经问询过一位城市社会学家:“上海是中国城市的建设的先锋,为什么还会要犯这样低端的错误?”这位社会学家回答:“上海毕竟要进入汽车时代了,一切都要为汽车让路。为了提升城市交通流转速度,必须拓宽街道。”笔者并不认同上述观点。日本、英国、加拿大的汽车驾驶者可以为行人等十几分钟而决不鸣喇叭,中国的汽车一族为何非要在幽静的住宅区飙车奔驰!拓宽后的上海街道给人带来5种负面效应。其一,上海的汽车时代到来后衍生出一种潜规则,即行人必须无条件地给汽车让路。这种习惯加重了行人的心理和生理负担。其二,单位时间内过车率提高,加大了汽车尾气的排放量,导致更为严重的空气污染,直接或间接地危及民众健康。其三,汽车高速行驶给市民带来一种非居家式的感受。大量高速行驶的汽车犹如一枚枚燃烧的导弹,让行走在街面的人无法将自身和宜居城市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人们的安全感普遍降低。其四,拆除掉大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建筑,严重破坏了街区的历史文脉,造成一种历史的割裂感,同时也间接地对人的精神形成一种打击,这种审美的倒退感一直会影响到人的心理健康,降低了人对城市的审美愿望和精神愉悦度。其五,拓宽后的马路意味着失去了种植更多绿化植物的空间,间接地失去了大量本应存在的由植物释放出来的氧气。总而言之,一切为汽车让路的做法弱化了上海市民的安全系数。面对导弹般的汽车、雾霾般的尾气、一望无际的宽阔马路,退休的市民很难有心情去跑步、散步,年轻的一代更难以去谈情、说爱,上海市民几乎失去了体验上海文化的优雅格调的机会。原先自然而优雅、摩登而时尚的海派生活方式几乎在一夜之间荡然无存。白岩松在解读城市魅力时曾认为北京不适宜散步,因为北京有宽阔无比的长安街,从而认为北京只能行车,不适宜散步,同时认为上海是一个适合散步的城市,理由是上海的小街蜿蜒



妩媚、树影婆娑,充满了浪漫情调。然而,中国城市千人一面的风貌雷同症最终还是感染到上海身上,并成为上海人的心灵之殇。形成此局面的动因或许很多,但主要还在于人们顽固地具备了一切为了经济增长让路的思维。“如何在宜居城市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稳定增长,以及在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带动城市的宜居性建设,从而实现宜居城市的建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促进是未来城市建设努力的方向。上海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宜居性建设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且宜居性建设在大城市发展过程中将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在未来城市发展规划中,中国大城市政策制定者应当参照宜居性建设情况,制定针对性的城市规划及宜居性建设政策,从而达到城市宜居性建设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14]当人成为GDP的俘虏以后,人就永远失去了自由,也会失去对美学、理想以及终极目的的思考空间。人如此,城市亦如此。

城市是人的延伸,而人并非是一种凭借经济实力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族类。在一切为了GDP的权威思想的统摄下,人总会丧失一些原本属于自然思维范畴的常识。退一步而言,上海维持旧时风华可能会像巴黎一样,会在旅游业上得到数倍的经济补偿。那是一种更高的利益诉求和更完美的高端设计。事实也是如此,上海仍在享用西侨设计的街道美学。且以上海的马拉松的景观道路设计为例,上海国际马拉松赛起始于1996年,其主办单位为中国田径协会、上海市体育总会,赛事举办到2016年已达21届。根据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官网公布的2016年的路线图可知,上海国际马拉松赛的路线包括了既包括了外滩、南京东路、南京西路、华山路、淮海中路这样的传统的建筑精华路线,还有宛平南里、龙华路、中山南二路、八万人体育场这样的新辟路线。尤其是前者,融汇了上海百余年建筑精华,更可为赛事带来最大的亮色。2016年的上马路线还增加了中共一大会址,同样为赛事添加了更多的文化内涵。众所周知,马拉松赛事是一种景观赛事,它和举办地的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关系十分紧密。当人们享有眼前的上海美景之时,无法释怀那些为了设计这样的城市而做出创造性业绩之人。

广义而言,体育是一种健康观念、愉悦规则、审美典范。一座失去愉悦感的城市显然是一座丧失了灵魂的城市。好在上海依旧是一座充满了超强自救力的城市。大量拓宽的道路让上海人几乎失去了基本的安全感,通衢般的大道也让上海失去了其真实性,当上海市民感受到由于某种城市美学缺失而造成的身体和精神的不适后,立即就发出了动议。众所周知,上海和北京不同,无法缔造出四平八稳的中轴线,尽管人民广场已经缔造出一些与周边环境不太协调的笔直的道路,却依然为此而付出了破坏周边环境和谐性的巨大代价。上海本是依苏州河和黄浦江的曲线缔造出来的城市,所有的道路都依河而走,呈现出一种蜿蜒曲折之美。许多优秀建筑如武康大楼、大光明电影院都有依河、依路而为的曲线外形,这种曲线是自然的杰作,极为符合人的审美特性。人们在一道道的曲线式的街道中漫步,可以不断地欣赏到别开生面的风景。婆娑的梧桐树、幽静的城市乡村、原始乔木扑簌而下的落叶、自然风化的落

花或草,为高度强直化的上海增添了不少田园意趣,繁华异常的上海时而再现一种落叶遍地的城市绝唱,而那些花色纷繁的绿地洋楼,更是构筑了上海住宅区的别样的风华。但是,这些东西却随着一次次的市政改造工程而减弱、损毁甚至消亡。这一切都无法让人对上海举办一场奥运会产生足够的信心。

上海可以舍弃奥运会,却决不可舍弃徐汇区、静安区、黄浦区优雅摩登的住宅区,更不应该舍弃那些充满蜿蜒之美的小街。上海的经典街道不仅仅是外滩长堤、南京路、淮海路,还有武康路、绍兴路、思南路、五原路、湖南路、东平路、复兴西路、余庆路。面对来势汹汹的拆建大潮,上海的市民其实一直都在做出最后的内心挣扎。人们终于听到了文化人的叹惋之声。陈丹燕最终还是写出了《永不拓宽的街道》,那是一种拯救者的呼喊,更是一种为了逝去的街道所唱的丧歌。然而,文化人的觉醒未必意味着行政者的觉醒。上海的市民但愿相信,那些逝去的街道还会在不远的将来再度出现,上海的小街仍将恢复其错落有致、风姿婉约的超凡的美感。那些逝去的小街还会在某一个时间结点上恢复重建,就像德国的德累斯顿,俄国的圣彼得堡、英国的考文垂、波兰的华沙。那该不是一种梦想。一个宜居的城市理应是一种美的城市,而一种美的城市一定是高端设计、高端维护且高端自赏的城市。

上海一直是一座充满了自赏型的城市,久居上海的市民不会相信举办一场什么盛会会给上海带来无穷的福祉。举办任何一种颠覆性的盛会都不会改变上海之本性,却极有可能成为一种错误理念的种植时机。自由撰稿人乔冉也在为此担忧:“上海喜欢在道跑上慢跑的人也越来越多。然而,当身边的汽车呼啸而过,跑步就变成了令人心惊胆战的冒险行为,人们需要的是6车道的马路旁,一条由橡胶颗粒铺设的步行道,还是一条像武康路般静谧安宁的永不拓宽的街道。当身体游走在不规则的城市空间中,眼睛更愿意看到自由生长的绿,而不是中规中矩的灰,一座体育城应该是座宜居城。”^[16]担忧者的话犹如一种警钟,将一种美好祈愿放置在民众面前,人们只能挑选,然后等待有效的裁决。当然,奥运会仍旧是西方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高端的文化类别,上海人仍需积极思考上海之城和奥运会的诸多联系结点。但须明知,奥运会的高端性一直体现在对举办国城市既有文明的尊崇内蕴,它从未割裂举办城市的文化根脉,而应以强化这种根脉为前提。奥运会是一种思想,而绝不仅仅是一种赛事。奥运会是一种理念,而绝不仅仅是一种体育竞技。奥运会是一种创造力总汇,而不仅仅是一种一切为赛事流程服务的机械的路线图。质言之,奥运会所带来的应该是一种更为高端的城市设计思想,一种高尚而优雅、普世而真诚的道德力和审美力的升华状态。

5 结语

在2025年将上海建设成世界体育名城是上海人之福。在日趋老龄化、青少年参与体育时间锐减、大妈靠跳广场舞打发时光的时代,上海市政府高调部署建设世界知名体育城市的计划自然会得到广大市民的积极响应。同时,

(下转第24页)



- [20]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37.
- [21]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492-498.
- [22] 上海图书馆.老上海风情录(四):体坛回眸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8.
- [23]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01-103.
- [24]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39.
- [25] 上海图书馆.老上海风情录(四):体坛回眸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9.
- [26]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34-140.
- [27]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45.
- [28] 郭玉成,许杰.精武体育会与中央国术馆的武术传播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5(2):77.
- [29] 许燕秋.精武第一分会绍兴精武会考[J].上海体育史话,1990(4):36.
- [30]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42,107-108.
- [31]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出版社,1996:118.
- [32]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40.
- [33] 上海图书馆.老上海风情录(四):体坛回眸卷[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10.
- [34]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出版社,1996:5.
- [35]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41.
- [36] 匡淑平,虞重干.上海近代体育报刊发展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9(8):143-146,150.
- [37]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11.
- [38] 沈文彬.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152-153.
- [39] 沈文彬.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111-112.
- [40] 沈文彬.中国的足球摇篮——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1896-1949)[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5:133.
- [41] 蔡扬武.从精武体育会看东方体育与西方体育的交汇[J].体育文史,1992(6):8.
- [42]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47.
- [43] 我国国术表演大受观众欢迎[N].申报,1936,8(13):2.(影印本第343册329页).
- [44]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42.
- [45]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27-28.
- [46] 匡淑平.上海近代体育研究(1843-1949)[D].上海:上海体育学院,2011:187.

(责任编辑:杨圣韬)

(上接第17页)

人们理应设想出2025年以后体育在上海人心目中的地位问题。现代体育原本是西方文化的一种,在眼前则是强势的英美法系的依托物,上海构建体育名城的根本性价值在于彻底厘清国际高端城市建设理念的内在价值。任何一种赛会都无法脱离现代性而独立存在,上海既有的英美法系传统理念应是其高速发展且不至于与世界脱轨的先天条件。还要回到城市的对比类系中。体育城和奥运会的关系更为紧密,奥运会和足球世界杯不同,举办奥运会只需一座城市,因此,奥运会始终寄寓着一种城市美学理念,其设计规则以及法系传统的价值要远远大于其赛事价值。在身体学的意义上考量,它极有可能成为一种强化上海固有价值的未来支柱。

参考文献:

- [1] 薛理勇主编.上海掌故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472.
- [2] 张鸿声主编.上海文学地图[M].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2:87.
- [3] [美]凯斯纳.资本之城[M].赵恒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4:1.
- [4] 《上海体育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体育志[M].上海:上海体育学院出版社,1996:13-14.
- [5] 郎静.近代体育在上海:1840-1937[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187-188.
- [6] 乔冉.重塑市民的体育观念:与体育社会学学者陆小聪谈城市体育发展问题[J].体育科研,2016(3):47,47.
- [7]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M].长沙:岳麓书社,2010:139.
- [8] [法]白吉尔.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M].王菊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190.
- [9] 于晨.腾飞中的上海体育[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5.
- [10] 上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上海体育年鉴·1995[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3.
- [11] 林少雄.纪实影片的文化历程[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3:96.
- [12] 中国建设报社《建筑创作》杂志社编.点击中国建设:回眸2004·影响2005[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64-65.
- [13] [美]理查德·桑内特.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M].黄煜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254.
- [14] 杨上广.中国大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271.

(责任编辑:杨圣韬)